

2009-2017 年間 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通論及近代以前部分

陳忠純*

摘要

近十年來，大陸的臺灣史研究（通論及近代以前部分）無論在廣度或深度均有長足的發展。尤為突出的是清代臺灣史，無論各類資料整理或是學術著述，均有頗為豐厚的成果。其中，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受到學界的重視，相較而言，經濟史研究的熱度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對原住民研究興趣較之以往更加濃厚，顯示大陸臺灣史研究日趨多元且深入。當然，通過論文統計還可看出兩岸關係史研究所佔比例較高，其原因除了特定時代促使大陸學者重視研究和重現兩岸的歷史聯繫，也有大陸學者所擁有的文獻資料等研究條件更利於從事相關主題的研究。

大陸地區的文獻資料整理與學術研究顯示了良好的互動效應。前者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有助於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深入，而學術研究的進步，也進一步刺激文獻資料搜集整理的加強完備。無論是官方的檔案文獻，還是民間的契約文書，都有不少的成果。此外，兩岸學者學術交流的成果也不斷增多。

關鍵詞：大陸臺灣史研究、通論、近代以前、論文、專著、史料彙編

*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來稿日期：2019 年 3 月 7 日；通過刊登：2019 年 4 月 8 日。

- 一、前言
 - 二、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通論類」著述進展
 - 三、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學術期刊論文成果數據分析
 - 四、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學術期刊論文舉要
 - 五、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專著、論文集通述
 - 六、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涉臺史料的出版
 - 七、結論
-

一、前言

本文對過去近十年間（2009-2017）大陸地區涉及近代以前（即1895年以前）臺灣史及臺灣史通論的研究成果，作一番回顧及檢討。須要說明的是，過去十年間，相關各類研究成果數量繁多，僅依據大陸地區學術期刊收錄最全的資料庫「中國知網」（CNKI），筆部就查到近千篇的文獻。此外，還有不少論著、史料彙刊等出版物以及部分研究生學位論文。限於時間及篇幅，本文只能就相關研究成果作鳥瞰式的梳理與分析。

這裡先簡要介紹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基本環境。2009年以來，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領域的研究力量和條件繼續得到改善、提升。¹ 大致體現在幾個方面：1、研究隊伍得到加強，研究生招生規模也不斷擴大。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下稱中國社

¹ 既往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的狀況，可參見張海鵬、李細珠主編，《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陳小沖，〈近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8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7樓第一會議室，2009年12月17日），頁1-24；陳忠純，〈大陸臺灣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分析：以《臺灣研究集刊》歷史類論文（1983-2007）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09：2，頁71-81等。〔按：中國大陸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科院)臺灣史研究室、福建省閩臺緣博物館等單位的研究人員逐年擴充,廈門大學等高校的臺灣史專業研究生招生數量也有增加。其中,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及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於 2002 年的成立,改變了一直以來大陸只有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有專門齊整的臺灣史研究隊伍之局面,可謂近二十年來大陸臺灣史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該所培養了不少年輕的研究人員,不僅壯大和拓寬了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的力量和領域,也提升了臺灣史研究在大陸歷史學界的地位。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現今大陸地區文史研究生招生指標逐漸讓位於理工學科的情況下,臺灣史專業招生規模仍得到維持且有微增,顯現國家對涉臺人才培養的重視。

2、新的涉臺文史刊物出版。以往大陸缺乏高水準的專門涉臺文史學術刊物,最有重要的臺灣研究專門刊物為《臺灣研究集刊》與《臺灣研究》。不過,後者由於辦刊宗旨變化,近年基本不登文史類稿件。近十年間,專門的涉臺文史學術刊物開始出現。其中以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辦,該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編撰的《臺灣歷史研究》;福建省閩臺緣博物館主辦的《西岸》(後改為《閩臺緣文史集刊》);閩南師範大學閩臺文化研究所主辦的《閩臺文化交流》等刊物的較具品質及影響力。

3、涉臺文史研究得到國家的重視,年度獲得立項資助的臺灣史領域課題不斷增多。以國家社科基金為例,迄今(至 2018 年)在「中國歷史」學科內,獲立項的課題總共 29 項。在 2009 年以前(不含 2009 年),涉臺課題獲立項總共才 6 項。2009 年以後,逐年遞增。2017 年,獲立項的課題達到 5 項。2018 年,也有 4 項之多。³ 應該指出,涉臺課題獲立項數的增多,除了國家對臺灣史研究的重視,也與近年來社科研究經費大幅增加,有很大關係。

在機構、刊物、經費都有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大陸臺灣史研究繼續得到較為長足的發展。以下從期刊論文、專著、論文集及史料整理等方面,對 2009-2017 年間大陸臺灣史研究(通論及近代以前部分)作簡要的梳理。

² 張海鵬、李細珠主編,《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頁 3。

³ 參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據資料庫」,下載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fz.people.com.cn/skygb/sk/>。國家社科基金其他學科也有涉臺歷史的立項項目,不過數量較少,在此僅以「中國歷史」學科立項數說明。

二、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通論類」著述進展

陳小沖教授在 2009 年發表的〈近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所統計的臺灣史論文，涵蓋了 CN 刊號的正規學術雜誌和正式出版的論文集。但 2010 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發表的論文數量已大大超越以往，各類正式出版的論文集數目繁多，且因大陸的學術統計標準，與會論文在論文集出版之前，多以單篇的方式先行發表，以此之故，短期內要對各類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作全面的收集整理，恐力有未逮。為此，筆者選擇大陸地區學術期刊收錄最為全面及時的「中國知網」資料庫作為主要出處，檢索 2009-2017 年的相關學術論文。首先，本文就近年大陸臺灣史研究中通論部分的內容稍作介紹。據筆者所見，近年來在期刊發表的通論性論文大致有 19 篇左右，研究主題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領域。

不過，有關臺灣史通論部分的成果主要還是集中於專著或編著類。筆者自檢索大陸國家圖書館檢索到 21 部相關著述。其中，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連續出版了兩部張海鵬與陶文釗合編的臺灣通史，即《臺灣簡史》和《臺灣史稿（上、下卷）》。⁴ 前者偏向於學術普及讀物，後者則屬於學術研究成果。兩書借鑑已有的學術成果，在分析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試圖寫成平實客觀的著述，並致力傳播嚴謹的臺灣歷史知識，檢討臺灣經濟起飛的成因，研究西方列強侵略與臺灣發展的關係，探討重大問題的成因，剖析臺灣的發展走向。《臺灣簡史》對近百年的歷史作簡明的概括與分析；《臺灣史稿》分上、下兩卷，共計 108 萬字，有別於以往著重清代臺灣的歷史，該書採取詳今略古的寫法，將臺灣史分為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並將重點置於日據時期和光復以後。

通史性的著述還有如張春英主編的《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史（上、下卷）》，該書立意系統研究兩岸的歷史淵源與現今兩岸關係形成、發展及演變的過程，展示兩岸相依相存的歷史事實。⁵ 林仁川教授等主編的《中華地域文化通覽·臺灣卷》對臺灣文化作了較全面的論述，指出臺灣文化雖然受到一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其主要影響來自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從而形成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並含有一

⁴ 張海鵬、陶文釗主編，《臺灣簡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張海鵬、陶文釗主編，《臺灣史稿（上、下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⁵ 張春英主編，《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史（上、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些次文化的特徵。」⁶ 此外，還有諸如程朝雲的《臺灣史話》、楊益茂等編著的《臺灣：歷史與現狀》以及杜輝的《據有他者：帝國、知識與臺灣原住民物品收藏實踐（1840-1945）》、龍金順等編譯的《近代閩臺社會風貌：〈教務雜誌〉文章選譯（1867-1941）》等不同領域的論（編）著。⁷

通論性著述還有張海鵬、李細珠合編《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和李細珠主編《中國大陸臺灣史書目提要》等。前者是大陸地區首次系統梳理和總結 1949-2013 年間大陸地區學界對臺灣史的研究狀況，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是關於臺灣通史撰寫及臺灣史研究的理論方法等宏觀問題的討論，第二章至第六章大致按時段敘述不同時期對臺灣史的學術研究狀況。每章基本上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按問題評述重要研究論著的學術貢獻，釐清相關問題研究的發展脈絡；二是概述重要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情況，提供相關研究資料的線索；三是指出既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指明新的研究方向。⁸ 《中國大陸臺灣史書目提要》一書彙整了 1949 年以來大陸學者在大陸及海外地區出版的有關臺灣史研究的各類著作與資料，作為臺灣史學科建設的基礎工程，是學習研究臺灣史的入門書籍。⁹

有關臺灣歷史的宏觀敘述及史觀探討，以陳孔立教授的著述最豐碩也最具影響力。2013 年，陳孔立教授出版論文集《臺灣史事解讀》，該書在第一部分討論臺灣研究的史觀與方法論問題。陳氏認為，由於兩岸分隔多年，在史觀上存在不同看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並且兩岸現有不同的史觀與政治立場分不開，進而導致認同問題。陳氏提出，兩岸有必要建立臺灣史研究的交流平臺，應該「通過學術討論，取長補短，共同提高」。¹⁰ 陳孔立教授以「兼顧史觀」總結許倬雲教授在其《許倬雲說歷史：臺灣四百年》中提到觀點：「我對臺灣的觀察和體驗，

⁶ 林仁川、盧美松主編，《中華地域文化通覽·臺灣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

⁷ 程朝雲，《臺灣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楊益茂、宋桂芝編著，《臺灣：歷史與現狀》（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杜輝，《據有他者：帝國、知識與臺灣原住民物品收藏實踐（1850-1945）》（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7）；龍金順等編譯，《近代閩臺社會風貌：〈教務雜誌〉文章選譯（1867-1941）》（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

⁸ 張海鵬、李細珠主編，《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

⁹ 李細珠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大陸臺灣史書目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¹⁰ 陳孔立，〈前言〉，收於陳孔立，《臺灣史事解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頁 1。

也是既非完全臺灣人的，也非完全大陸人的，而是嘗試著兩面兼顧，所以看得較為清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構兩岸「共同史觀」的可能性。陳氏說：「建構共同史觀並不是要建構一種完整的史觀來取代現有的各種史觀，而是要吸取各種史觀中若干雙方可以接受的基本要素，形成具有兩岸特色的共同史觀。這種史觀需要一個形成過程，它不是一步到位建立起來的，而是逐漸積累。隨著兩岸共識的增長不斷地添加雙方可以接受的要素，不斷地充實其內涵，逐步形成共有觀念，增進互相認同」。¹¹

三、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 學術期刊論文成果數據分析

近代以前的大陸臺灣史研究包括了早期臺灣史、荷據臺灣史、明鄭臺灣史和清代臺灣史，以下分別予以詳細說明。

荷據以前的早期臺灣史研究搜索詞比較難以確定，筆者以主題詞「臺灣」，加「全文」項「遠古」，或「島夷」，或「流求」等詞，分別錄得 38 篇、45 篇和 49 篇。¹² 荷據與清代時期則採取主題詞「臺灣」，加「全文」項「荷據」或「清代」，分別錄得 69 篇與 872 篇。由於檢索關於明鄭時代的研究論文時，容易與荷據及清代時期的文章重複，故筆者改用「明鄭」作為主題詞，檢索到 17 篇論文，加上其他檢索項的參照補充，總共搜集到 20 篇涉及明鄭時期的研究論文。經過逐篇篩選，筆者大致檢索到早期臺灣論文 35 篇，明鄭時期 18 篇，荷據時期 22 篇，清代 435 篇，跨時段通論 19 篇（其中僅涵蓋近代以前的論文有 7 篇）。當然，考慮到使用其他詞搜索還會查詢到更多的結果，以及還有其他正式出版的論文集等，過去近十年間臺灣史研究方面所發表的論文數量，無疑超過本文統計的資料。據筆者估計，研究清代時期的論文數可能會超過 600 篇。這還有待於未來更詳細精確的梳理。

¹¹ 陳孔立，〈建構兩岸共同史觀的嘗試〉，《臺海研究》（上海）2017:2，頁 5；許倬雲，《許倬雲說歷史：臺灣四百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年修訂版），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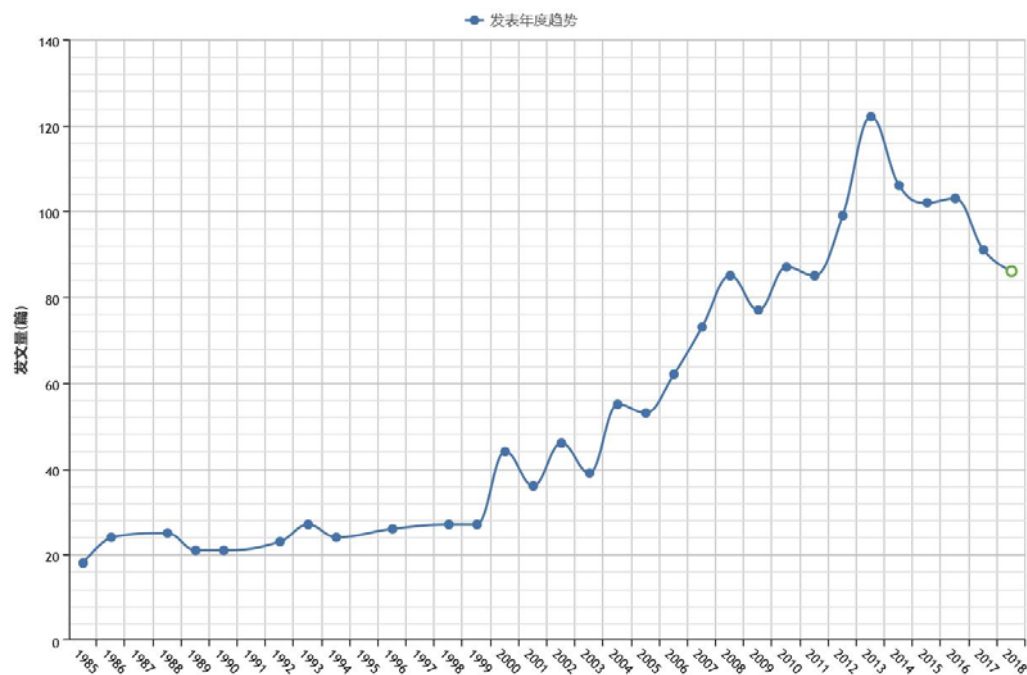
¹² 使用「遠古」、「島夷」、「流求」等詞，分別檢索出，其中多有交叉，雖難以統計精確篇數，大致總數有 35 篇。

表一 2009-2017 年間早期臺灣、荷據時代及清代時期
相關正式發表論文數目

| 「全文」項 「主題」項 | 「遠古」「島夷」「流求」 | 「荷據」 | 「清代」 |
|----------------|--------------|------|------|
| 「臺灣」 | 35 | 22 | 435 |

說明：筆者統計製表。

表二 1980 年以來大陸地區期刊清代臺灣史研究論文
的發表數量變化趨勢



說明：檢索方式：「臺灣」【主題詞】+「清代」【全文】。以上數據由筆者統計繪製。

通過檢索我們還可瞭解到，2009 年以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成果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從表二可以看出，2000 年以後，大陸地區刊發的清代臺灣史研究論文開始明顯增長。2009 年以來，穩定在每年 80 篇以上，近 5 年更達到 100 篇左右。其他時段的臺灣史研究雖然絕對數量沒有這麼多，但增長趨勢同樣明顯。值得注意的是，表二顯示 2013 年的論文發表數達到一個高峰。這或與當年為康熙統一臺灣

表三 各時段各領域研究論文的分布情況

| 研究領域 \ 時代 | 早期臺灣 | 荷據臺灣 | 明鄭臺灣 | 清代臺灣 | 跨時段 (僅涵蓋近代以前) | 總計 | 佔總數 比例 |
|-----------|---------------|------|------|-----------------|------------------|-----|-----------|
| 政治軍事史 | 5 | 7 | 5 | 66 | 1 | 84 | 16.2% |
| 經濟史 | 0 | 3 | 3 | 31 | 3 | 40 | 7.7% |
| 社會史 | 0 | 6 | 0 | 81 | | 87 | 16.8% |
| 文化教育史 | 16 (典籍研究5) | 3 | 5 | 138 (典籍研究33) | 3 | 165 | 32% |
| 宗教及民間信仰 | 9 | 0 | 0 | 46 | 0 | 55 | 10.6% |
| 人物 | 3 | 2 | 4 | 53 | 0 | 62 | 12% |
| 其他 | 2 | 1 | 1 | 20 | 0 | 24 | 4.6% |
| 總計 | 35 | 22 | 18 | 435 | 7 | 517 | 100% |

說明：筆者統計製表。

表四 有關原住民研究與兩岸關係研究的論文數量及所佔比

| 研究領域 \ 時代 | 早期臺灣 | 荷據臺灣 | 明鄭臺灣 | 清代臺灣 | 總數 | 佔總數 比例 |
|-----------|------|------|------|------|-----|-----------|
| 原住民 | 13 | 7 | 0 | 49 | 69 | 13.3% |
| 兩岸關係 | 17 | 6 | 5 | 116 | 144 | 28% |

說明：筆者統計製表。

330 年周年有關，學界因此出現集中撰文討論清代臺灣史的盛況。2013 年，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在蘭州召開了「紀念康熙統一臺灣 3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論文就有 52 篇之多。¹³

從相關研究的領域看，早期臺灣史主要集中於考古文化和原住民的宗教習俗，其他時期則比較平均，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及人物研究所佔比例較高，而以往比較受重視的經濟史研究，有趨冷之勢。¹⁴

從研究領域中還可以看出，大陸臺灣史研究十分注重兩岸歷史淵源的考察，

¹³ 程朝雲，〈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與再出發：紀念康熙統一臺灣 3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紀念康熙統一臺灣 3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頁 503。

¹⁴ 表三中的分類依據如下：「政治軍事史」主要涉及清廷官方治臺及禦外的政治軍事措施；「社會史」主要涉及諸如社會變遷、民變事件、民間械鬥、宗族演變以及漢番關係等；「文化教育史」主要涉及清代臺灣的文教科舉事業、士紳文化活動等；「宗教及民間信仰」即統計宗教民間信仰類研究成果；「人物」則統計人物研究情況；「其他」涵蓋上述研究以外的，諸如學術史回顧、學術評論、學術著述出版介紹等。

相關論文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探討了大陸各省或地區與臺灣的歷史聯繫，進一步拓展了臺灣史研究的地理空間。同樣，原住民的歷史得到相當的重視，筆者收集到有關原住民的論文有 69 篇，說明近年大陸臺灣史的研究重點日趨多元。

四、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學術期刊論文舉要

在早期臺灣史研究中，大陸學者關注的重點主要是揭示早期大陸政權如何經略臺灣及原住民與大陸的文化淵源。這方面，徐曉望教授近年著力頗深，發掘不少以往罕見的中文材料，對舊說作了修正或深入。如他在新發現的北宋李復書信中，找到當時流求國對待華人很客氣，設館招待的記載，並結合相關典籍及地理常識，推斷北宋時期的「流求國」是臺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的主人。¹⁵ 徐曉望在另一文中，論證元代出兵「瑠求」的出發地「汀路尾澳」，應即是在澎湖的內港之一「風櫃尾澳」，而元朝水師長期在澎湖駐紮，說明澎湖不僅是「泉之外府」，而且是當時的軍事重鎮，其目的是震懾臺灣海峽的海盜，確保泉州航路的通暢。¹⁶

魯西奇教授在〈流求王歡斯渴刺兜：臺灣歷史上的「印度化時代」〉一文中，認為六世紀後期至七世紀初，統治臺灣島（或其部分地區）的流求王族很可能來自扶南，並提出臺灣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一個短暫的「印度化」時代。魯氏依據〈隋書·流求傳〉、〈太平寰宇記〉、〈梁書·扶南傳〉、〈南齊書·扶南傳〉、〈晉書·扶南傳〉等文獻，認為〈隋書·流求傳〉所提及的流求國，有兩種人群和文化因素：一種是來自扶南、居於統治地位的王族，他們「深目長鼻，頗類于胡」，其表現出來的印度文化特徵僅是一種上層社會的文化，影響範圍較小；另一種是土著的「夷洲」人群，「人形短小」，其文化代表臺灣本土的文化，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深厚的根基。因此，扶南裔流求王族統治下的流求文化可界定為「印度——夷洲文化」。¹⁷ 張崇根教授認為依據考古學與現代臺灣世居少數民族的源

¹⁵ 徐曉望，〈論唐宋流求與臺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2：1，頁 5-12、112。

¹⁶ 徐曉望，〈元代瑠求及臺灣、澎湖相關史實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1：4，頁 49-57。

¹⁷ 魯西奇，〈流求王歡斯渴刺兜：臺灣歷史上的「印度化時代」〉，《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漢）2017：5，頁 120-128。

流關係說，支持臺灣世居少數民族多元來源的觀點。他在〈臺灣世居少數民族源於東夷說述論〉中著重論證其中的「東夷說」，臺灣世居少數民族與古代聚居於靠近渤海、黃海的海岱地區之東夷人有著較多相同的文化特質，故可能主要源自東夷。¹⁸ 周運中考察了史籍上記載的南宋時期侵擾澎湖和泉州的毗舍耶人和談馬顏人，認為前者可能是從菲律賓中部米沙鄢群島遷居到臺灣南部平原的放索人，依據是米沙鄢人與放索人體貌、風俗完全吻合，且毗舍耶即放索的異譯。而談馬顏人則是臺南的雅美（達悟）族人，他們可能是從巴布延群島北遷到蘭嶼。¹⁹

吳春明教授考察了阿美族卑南群都蘭部落人的「樹皮打布工藝」，並比較華南、東南亞和太平洋土著樹皮布文化，指出阿美族、傣族、黎族、布魯-雲僑族、南島語族等樹皮布文化有基本的共性，又同處於古代百越-南島土著文化共同體範圍內，印證了漢文史籍所載「南蠻」民族之「島夷卉服」、「織績木皮」的統一性，反映了樹皮布文化從亞洲東南海岸地帶產生、向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地帶傳播、發展的邏輯進程。²⁰

荷據時期臺灣史方面的研究，有賴於近年來《熱蘭遮城日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等西方材料的發掘、翻譯，相關研究得到一定的進展，尤其當時代歷史人物、臺海地區貿易往來等情況較之以往更加清晰。張彩霞、林仁川利用上述資料，質疑以往認為歐洲人主導了十七世紀臺海貿易的觀點，並從貿易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主導貿易商品定價、制定臺海貿易市場規則等三個方面分析，認為當時臺灣海峽貿易市場的主導權掌握在鄭芝龍等中國海商手中。²¹ 黃俊凌則認為以往由「華商」或「荷蘭東印度公司」單方面主導的觀點不能全面反映實際的情形，當時的貿易主導權應是在明朝私人海商和荷蘭殖民者之間轉換，且受明朝與日本海外貿易政策的寬、嚴，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勢力的介入程度，華商集團內部的分化和競爭，明朝政局變化對商

¹⁸ 張崇根，〈臺灣世居少數民族源於東夷說述論〉，《黑龍江民族叢刊》（哈爾濱）2009:2，頁78-90。

¹⁹ 周運中，〈南宋臺灣毗舍耶人與談馬顏人新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頁5-9、17。

²⁰ 吳春明，〈臺灣阿美族的「織樹為布」工藝及其文化史意義〉，《廣西民族研究》（南寧）2009:3，頁145-157；吳春明，〈「島夷卉服」、「織績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2010:1，頁71-77、93。

²¹ 張彩霞、林仁川，〈中國海商：17世紀臺海貿易的主導者〉，《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10:4，頁71-76。

品生產的影響等多種因素交叉影響，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²² 陳思考察了顏思齊、李旦等人與荷蘭人的關係，他認為荷蘭殖民者入侵臺海地區後，顏思齊與之建立廣泛的往來交流，雙方一度合作密切，但很快便趨於疏遠，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與李旦有關。在這段微妙關係的背後，體現的是當時福建地方當局、民間海上勢力與西方殖民者三方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軍事鬥爭。²³

劉彼德利用《巴達維亞城日記》、《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等材料，論述了荷據時期的臺灣社會結構與特徵，指出荷蘭人統治下的臺灣是一個階級、性別、宗教及種族均不平等的社會。²⁴ 劉彼德、張先清、陳慎等還對荷蘭人與原住民的關係作了論述。²⁵

此外，徐曉望根據何喬遠《鏡山全集》所載相關史料，分析明末福建商人不熱衷於前往西班牙在雞籠、淡水的據點貿易的原因為：臺灣海峽的海盜活動、荷蘭殖民者的干擾、福建官府對貿易的限制、閩南商人經商意願在於臺灣南部以及日本鎖國政策對西班牙商人的拒絕導致淡水中轉港地位的下降等。²⁶

明鄭時期臺灣史研究的進展同樣得益於西人文獻的發現。陳思借助《熱蘭遮城日誌》的記載，重新回溯了「何斌事件」的來龍去脈，認為該事件是當時鄭荷雙方在臺灣經貿爭奪的集中體現，且是 1650 年代以後，鄭成功對臺經貿布局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強對當地大陸商人的影響與控制，挑戰荷蘭殖民當局，進而控制整個臺灣海峽的海上貿易，以便在與荷方的亞洲商業霸權競爭中佔據優勢。而這一事件的結局則最終促成了鄭成功收復臺灣。²⁷ 張先清、陳忠純等借助十七世紀活躍於明鄭政權統治區域的多明我會傳教士利勝（Victorio Riccio）的自傳，

²² 黃俊凌，〈17 世紀上半葉臺灣海峽貿易主導權問題新探：以荷蘭侵佔臺灣初期的轉口貿易為中心〉，《世界歷史》（北京）2016: 5，頁 95-110、159。

²³ 陳思，〈從各方史料看顏思齊與李旦及荷蘭殖民者之間的關係〉，《臺灣研究集刊》2017: 5，頁 79-85。

²⁴ 劉彼德，〈17 世紀荷蘭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結構和特徵〉，《臺灣研究集刊》2011: 3，頁 85-94。

²⁵ 劉彼德，〈1636 年淡水原住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鬥爭〉，《臺灣研究集刊》2010: 4，頁 67-76；張先清，〈傳教、衝突與文化解釋：17 世紀臺灣原住民與天主教的相遇〉，《學術月刊》（上海）2013: 12，頁 141-151；陳慎，〈從荷文史料看荷據時期臺灣原住民族關係〉，《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宜昌）2016: 5，頁 44-50。

²⁶ 徐曉望，〈明末西班牙人佔據臺灣雞籠、淡水時期與大陸的貿易〉，《臺灣研究集刊》2010: 2，頁 1-8。

²⁷ 陳思，〈再論「何斌事件」的前因後果：兼議鄭成功收復臺灣前的一系列動作〉，《臺灣研究集刊》2016: 5，頁 68-76。

探討了明鄭家族的內外活動以及與教會之間的關係。²⁸

明鄭臺灣的儒學是近幾年研究的熱點之一。左玉河〈明清鼎革之際的臺灣儒學〉一文討論了明清之際儒學思想的變遷，認為明鄭時期移入臺灣的儒學，是與鄭成功、陳永華淵源頗深的東林黨及浙東學派的經世儒學。它以經學和經世實學為主流，強調反清復明之思想，重視經世實學之復振精神，一掃晚明陽明學空談心性之學風，具有明顯的功利色彩。清統一臺灣以後，以程朱理學改造明鄭時期的臺灣儒學，改變其宗旨及內容，淡化其反清復明思想，遂使朱子學逐漸成為清代臺灣儒學之主流。²⁹ 還有學者討論了明鄭臺灣儒學人物以及臺灣儒學與閩學的關係等問題。³⁰

此外，鄧孔昭對明鄭臺灣天興、萬年兩縣的轄境作了新的探討，質疑以往主張天興縣（州）所管轄的地域就是清初諸羅縣的地域，萬年縣（州）的地域清初則分為臺灣縣和鳳山縣，或主張萬年所管轄的地域即為清初的鳳山縣，天興的地域清初則分為臺灣和諸羅二縣的觀點。他認為天興縣（州）的轄境，包含了清初諸羅縣的全部和臺灣縣的一部分，萬年縣（州）的轄境則包含了清初鳳山縣的全部和臺灣縣的另一部分，並對天興、萬年的分界線走向提出了看法。³¹ 鄧孔昭還梳理分析了鄭經的婚姻和情感生活對鄭氏集團的影響，認為由於鄭經沒有處理好婚姻和情感生活，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的兩次內亂。³²

如上所屬，近十年來，清代臺灣史研究成果相當豐厚，這一表現既源於相關研究得到重視，也與大批多卷本的明清宮廷檔案與民間文書史料整理出版有密切關聯（具體情況參見另節說明）。清代臺灣史研究的重點，首先是清政府對臺灣的認知及治臺政策的考察，這其中包括平民渡臺、土地開發、理「番」、建省等

²⁸ 張先清，〈17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學術月刊》2008:3，頁131-142；陳忠純，〈論傳教士利勝與鄭氏集團的關係：以利勝的外交使命為中心的考察〉，《臺灣研究集刊》2010:2，頁9-15。

²⁹ 左玉河，〈明清鼎革之際的臺灣儒學〉，《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3:6，頁99-105。

³⁰ 例如袁鈞，〈徐孚遠與幾社的創立與傳衍〉，《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頁56-64、106-107；陳舒劭，〈戰火中的傳承：明鄭時期閩臺儒學的親緣關係〉，《石家莊學院學報》（石家莊）2015:1，頁22-27；杜維超、張盛文，〈實學與閩學在臺灣儒學發展中的思想對立及合流〉，《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福州）2013:3，頁67-71。

³¹ 鄧孔昭，〈明鄭臺灣天興萬年二縣（州）轄境的再探討〉，《臺灣研究集刊》2009:3，頁57-64。

³² 鄧孔昭，〈鄭經的婚姻情感生活與鄭氏集團的兩次內亂〉，《臺灣研究集刊》2017:3，頁83-89。

方面的措施。賈小葉〈論清人對臺灣地位認知之變遷（1661-1875）：以官方為中心〉一文，討論了清政府對臺灣地位認知的複雜變遷，並認為以晚清為界發生明顯轉變：晚清之前，清人思考臺灣問題的出發點在於「靖邊患」，這不僅反映在康熙用兵臺灣的戰和決策中，而且反映在清政府的治臺之策上。晚清以降，隨著外患的進逼，清人對臺灣地位的認知逐漸發生變化。尤其在日本侵臺事件的刺激下，臺灣地位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版圖尺寸不敢以與人」的認知成為時人的共識。與之相應，清政府的治臺之策也由此前的「番界」政策轉變為「開山撫番」。³³ 陳忠純討論了清政府管理民人渡臺的「領照渡臺」政策的演變，認為清前期的領照渡臺制度，初期家眷渡臺可能還未被嚴厲禁止。康熙 50 年（1711）前後，由於擔心渡臺人口增長過快，提出限制「無產業無家室」的單身民人渡臺。雍正 2 年（1724）前後開始嚴格禁止偷渡，領照內容更加細化。此後直到乾隆 53 年（1788）幾乎禁止新的民人渡臺。清廷嚴禁民人渡臺的原因，一是擔心臺灣人口超過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懷疑冒險渡臺的閩粵窮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數過多將致「無窮之害」。林爽文事件被鎮壓後，福康安等人的實地調查讓清廷比較客觀地認識臺灣與民人渡臺問題，重新允許單身無業民人渡臺，並允許搬眷。至此，領照渡臺制度的內容基本穩定下來，直到牡丹社事件後被廢除。³⁴ 陳忠純還討論了清中央與地方關於治臺政策的不同主張及其影響。³⁵

李智君闡述了清政府對澎湖的統治政策及效果，認為不同於對臺灣本島的統治，清政府在澎湖的措施相當成功，在其治理下的兩百餘年裡，澎湖沒有發生一起叛亂事件，社會穩定，人口增長迅速，成為控制臺灣的軍事基地，有效地制止了海寇對東南沿海的滋擾。³⁶

有不少學者討論了清政府的理「番」政策，李祖基利用其新發掘的張嗣昌所

³³ 賈小葉，〈論清人對臺灣地位認知之變遷（1661-1875）：以官方為中心〉，《近代史研究》（北京）2014: 4，頁 67-83、160。

³⁴ 陳忠純，〈清前期平民領照渡臺的範圍探析：兼議限制渡臺政策的轉變及其原因〉，《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2，頁 76-84。

³⁵ 陳忠純，〈雍正時期閩臺地方官治臺主張探析：以沈起元的治臺論為中心〉，《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6，頁 81-90；陳忠純，〈19 世紀初期閩臺地方官開發臺灣東部「番地」的主張探析：以噶瑪蘭及水沙連地區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5: 4，頁 56-64。

³⁶ 李智君，〈海洋政治地理區位與清政府對澎湖廳的經略：以風災的政府救助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2: 11，頁 65-77。

撰《巡臺錄》一書，梳理了對大甲西社「番」變事件善後的處理和官方勸墾「番」地的記載，以及減輕臺灣田園賦稅和開放移民搬眷入臺等種種積極的開發措施，由此得出雍正年間政府對臺灣的土地開墾政策，較之康熙時期有了十分明顯的變化。李氏認為這種變化與雍正皇帝重視農本、獎勵墾荒政策有很大關係。³⁷ 劉正剛、喬玉紅認為清政府推行土著軍事化促進了土著從化外到化內的轉變，尤以乾隆末年屯番制和清末「開山撫番」較為典型。在臺灣歷次軍事行動中，土著幾乎都與官府並肩作戰，彰顯了王朝軍事化的成功，土著社會在軍事化過程中認同了王朝統治，也完成了從化外到化內的轉變。³⁸ 劉耀、陳文新利用朝鮮使者的紀錄，闡述了清代乾隆年間臺灣原住民參加賀壽朝覲活動的過程。³⁹ 孫煒根據黃叔璥所撰《臺海使槎錄》的紀錄，認為清政府針對「生番」、「熟番」，分別確立了防、撫兩種治理策略，力圖用「番界」將其固定在各自的生活範圍裡。從實踐上看，這兩種策略都具有消極性，延緩了臺灣的開發和發展，間接導致了清治臺期間「番」、民衝突不斷的不良後果。⁴⁰

臺灣建省問題是另一個研究重點。賈小葉注意到清政府在臺灣建省問題上，「幕後」的人事關係是影響臺灣建省決策的重要因素。她認為沈葆楨提出臺灣巡撫人選與駐臺辦法時，其個人經歷與人際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爾後，不同的主持者因個人經歷與人際交往的不同，對沈葆楨的方案提出大小不同的異議，導致良好的制度設計並沒有得到有力地推行。中法戰後，巡撫駐臺之議再起，各人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沒有超出日本侵臺後的相關討論。而最後選定的臺灣建省，也與沈葆楨的巡撫駐臺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從日本侵臺到中法戰爭，臺灣建省問題整整經歷了十年的討論與反復，才得以塵埃落定。這其中不僅暴露了地方督、撫之間的推諉、因循，更暴露出晚清中央政府的腐敗與無能。⁴¹ 鄭永華說明了 1980 年

³⁷ 李祖基，〈論雍正年間臺灣「番」地開墾政策的變化：以《巡臺錄》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0: 3，頁 1-10。

³⁸ 劉正剛、喬玉紅，〈從化外到化內：清代臺灣土著軍事化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成都）2010: 1，頁 267-272。

³⁹ 劉耀、陳文新，〈朝鮮使者筆下的臺灣原住民賀壽朝覲活動述略〉，《東疆學刊》（延吉）2016: 4，頁 7-12。

⁴⁰ 孫煒，〈防撫之間：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及應對：《臺海使槎錄》所反映的清前期治臺政策分析〉，《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恩施）2011: 2，頁 113-116。

⁴¹ 賈小葉，〈晚清臺灣建省的臺前與幕後〉，《史學月刊》（開封）2016: 7，頁 88-98。

北京出土的「鎮守福建臺灣等處總兵官之關防」的背景，藉以說明晚清臺灣建省的曲折過程及清代中央政權逐步加強臺灣地區管轄的歷史進程。⁴²

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及其中的「番」界主權問題，備受大陸學界重視。李理認為該年的日軍侵臺事件是日本近代對外殖民擴張及軍國主義的源起，而其幕後的指使支持者者是美國。「山原號難船事件」本為普通的海難事件，但在美國人的挑唆下，卻成為日本出兵侵略臺灣的藉口。而日本出兵臺灣，以為琉球民伸張正義為藉口，實質卻為切斷中國與琉球的藩屬關係，以達到最後「吞併琉球」的目的。⁴³

張衛明從清政府援用國際法處理牡丹社事件的過程中，看到中西方不同認知的衝突與調和。他注意到在同治 13 年臺灣漂民案中，知識精英和東南督憲借助奏摺、照會和報刊等文獻資料，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構建起國際法話語圈。論者廣泛援引萬國公法，形成諸如強調領土不容侵越、屬地原則下番地自治、指責日本據臺及索賠、禁止局外對日援助、保護在日華僑、請求國際仲裁之類的觀點和建議。他認為公法輿論不僅迎合了清政府「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的對日交涉策略，而且呼應甚或引導政府決策與軍事外交。以天下體系為主臬，晚清中國對國際法採取選擇性採納，內在地削減了由「實效管轄論」所造成的國際公法與天下體系之間的緊張與張力，展現了東西方國際秩序之間的對話與溝通。⁴⁴ 連晨曦也認為同治 13 年臺灣事件對晚清國家主權觀念的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它迫使清政府對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對外觀念進行修正。在列強的不斷衝擊下，清政府終於將「萬國公法」作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武器，並逐步將國內各民族一視同仁地對待，這無疑是中國近代化歷程中的重大轉變，它對於今日的中國仍然具有借鑑意義。⁴⁵ 對此，賈益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分析了清廷對牡丹社事件中日人提出「番地無主論」的應對，認為經過此次外交挑戰，清廷上下對臺灣「番

⁴² 鄭永華，〈未經啟用的臺灣總兵關防與晚清臺灣建省之波瀾〉，《近代史研究》2014:4，頁 147-151；鄭永華，〈光緒三年新鑄臺灣總兵關防考論〉，《歷史檔案》（北京）2017:2，頁 101-108。

⁴³ 李理，〈1874 年日本出兵侵臺的幕後指使者〉，《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2015:6，頁 107-115、191。

⁴⁴ 張衛明，〈借法異域：1874 年臺灣漂民案中的國際法話語建構〉，《臺灣研究集刊》2014:1，頁 31-40。

⁴⁵ 連晨曦，〈1874 年臺灣事件與晚清國家主權觀念的轉變〉，《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秦皇島）2016:2，頁 70-74。

民」、「番地」與中國主權的關係，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而這些認識，並非出於對西方「萬國公法」的認同，而是傳統體系內部的適當調整。另一方面，為應對邊疆危機而把「番地」逐漸納入「腹地」的行動，在近代條件下，成為中國逐漸由「天下」走向「萬國」之一的重要一環。⁴⁶

關於「生番」地界的問題，李智君從中國主導的東亞朝貢體系的角度作了論述，他認為西方殖民者的出現，使得原本由中國主導的東亞傳統地緣政治關係和海上國際救助體系，被徹底打破。尤其是英國入侵後，原本是大清國通過海上救助「宣示聖恩，俾該國之人咸知我皇上懷柔怙冒之至意」的區域，轉眼間變成各國相互廝殺的戰場。原本被列為「化外之民」的臺灣原住民，因他們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別於清政府建章立制的「教化之區」，而成為西方列強急於趁機掠取的「無主空間」。清政府被迫改變現狀，「開山撫番」，以保住外洋島嶼。⁴⁷

清代臺灣經濟史的成果不算多，徐曉望、徐思遠從宏觀上研究了明清時期閩粵海洋文化與臺灣海洋經濟形成的關係，他們認為，明朝海禁後，閩粵海洋文化向環中國海區域傳播，構成以閩粵人為核心的海洋貿易網路。臺灣作為閩粵海洋網路的一個樞紐，從其海洋經濟發生的一開始，就受到閩粵海洋文化巨大的影響。漳潮的海盜文化，是臺灣開發的基礎；閩粵的重商文化，培育了臺灣的商人階層；而閩粵沿海以出口為導向的海洋經濟移殖，是臺灣海洋經濟產生的原因，也是臺灣經濟能夠迅速走在中國前列的根本因素。⁴⁸

楊彥杰利用晉江東石蔡氏的家族文獻，結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調查等資料，對清代東石蔡氏在臺灣布袋嘴的魚塭經營進行縱向考察，同時就此個案反映出的股權經營形式進行探討。他認為，清代臺灣的魚塭經營有多種股權形式，一種為長期合股經營，另一種是在此基礎上演變出來、更為複雜的股權形式，如蔡氏經營的北中橫塭就有塭底份（大稅）、塭佃份（小稅）、現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轉贖的塭份等。這些不同層面的權力，既與土地經營有某種關聯或類似性，同

⁴⁶ 賈益，〈1874年日軍侵臺事件中的「番地無主」論與中國人主權觀念的變化〉，《民族研究》（北京）2009: 6，頁 88-98、110。

⁴⁷ 李智君，〈無遠弗屆與生番地界：清代臺灣外國漂流民的政府救助與外洋國土理念的轉變〉，《海文史研究》（泉州）2017: 2，頁 38-67。

⁴⁸ 徐曉望、徐思遠，〈論明清閩粵海洋文化與臺灣海洋經濟的形成〉，《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1，頁 5-13、38。

時也有自身的特點。⁴⁹

有關清代臺灣社會史、文化教育及宗教信仰方面的著述不少。社會史方面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有原住民與漢人、移民與臺灣社會變遷等關係；文教民俗方面則涉及了臺灣科舉、書院教育、臺灣儒學、神明信仰等問題，尤其注重探討閩臺文化淵源等關係。

鄧孔昭研究了清代的女性移民問題，認為經歷雍正 10 年（1732）到乾隆 4 年（1739）、乾隆 11-12 年（1746-1747）的兩次搬眷，對於緩解臺灣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狀況有很大幫助。鎮壓林爽文事件後，清政府取消了禁止攜眷的政策，臺灣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狀況進一步緩解，人口的大幅度增長，除了移民增長，人口的自然增長也應該達到較高的水準，說明人口的性比例已經較為平衡。⁵⁰

董建輝、周慧慧考察了清代臺灣埔里盆地的族群構成的變化，指出人口遷移、土地資源競爭是影響這一時期族群關係的主要力量。埔里盆地的先住民為埔、眉二番社。清中期，平埔族群開始遷入，形成多族群雜居共墾的局面。之後，平埔族群不斷蠶食先住民的土地資源，導致其生存空間嚴重壓縮，最終難逃被同化或他徙的命運。清末實施「開山撫番」政策，吸引漢人大規模進入盆地開墾，平埔族群逐漸失去其優勢地位，並開始走向漢化，從而深刻地改變了此後當地族群關係的格局。⁵¹

張侃、董麗瓊依據契約文書、總督府調查文獻等材料，考察了雍正、乾隆年間，以胡焯猷為首的汀州籍客家移民在淡水河流域開展的墾殖活動。他們認為客家移民面對「邊疆社會」的潛在風險採取了有效的生存策略，主要依靠從原籍帶來合股經營等方式進行各種經濟活動，應對墾殖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在墾殖過程中，移民們超越族群、地域、血緣的限制，與其他社會群體產生多元的文化互動，共同構建如書院、廟宇、家族等經濟-文化共同體，形成社會合成機制，在不同的歷史情勢中轉化出不同的社會身分。⁵²

⁴⁹ 楊彥杰，〈百年魚塢：清代東石蔡氏在臺灣的魚塢經營〉，《臺灣研究集刊》2013: 6，頁 69-82。

⁵⁰ 鄧孔昭，〈試論清代臺灣的女性移民〉，《臺灣研究集刊》2010: 5，頁 73-84。

⁵¹ 董建輝、周慧慧，〈移民、土地與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 3，頁 29-37。

⁵² 張侃、董麗瓊，〈清代臺灣北部的汀州客家移民合作墾殖和共有形態論析：以契約文書等文獻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 3，頁 44-60。

謝重光則闡析了清代臺灣客家義民的性質，認為客家義民是鄉村團結自保的民間武裝，其首要的第一位任務是保衛家園，在歷史上起到穩定地方秩序的作用，是保護社會安定的力量。⁵³

孔潮麗對洪麗完編著的《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作了較深入的解讀，總結清代臺灣家庭收養呈現出幾方面鮮明的特徵：一是異姓承繼相當普遍，「異姓不相為後」傳統倫理規範得不到貫徹執行；二是父權在清代臺灣社會仍然影響深遠，送養權的執行，歸根究柢就是父權的行使、延續和轉移；三是收養與送養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的本質是利益交換，帶有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與近現代為子女利益的收養大相逕庭；四是非法收養現象極為常見，與臺灣地區特殊移墾社會環境不無關係，也呈現出國家制度與民間實踐之間的強烈反差。⁵⁴ 蔣小波通過考察臺灣早期的節烈故事，認為這些故事主要和明清易代之際的政治動盪有關，並體現了史傳作者的家國之痛。清政府治臺之初就大力提倡節孝，一方面是為了將臺人對明鄭政權的感念轉化為對新政權的認同與支持，同時也出於治理臺灣移民社會之風化問題的現實需要。隨著清政府旌表範圍與規模的逐步擴大，臺灣的節烈婦女在人數上急遽上升。同時，清代臺灣的節烈婦女具有較廣泛的社會代表性，透過她們的節烈故事，可以看到當時臺灣的社會狀態與婦女生活的情況。⁵⁵

黃銘松試圖根據西文資料解讀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的樣貌。從西方學者的記載來看，當時的臺灣島除西臺灣外，清政府的控制力還顯得比較薄弱。在南臺灣和東臺灣地區，原住民的族群關係仍然相當緊張。中部高山地區基本處於封閉狀態，原住民番社之間的獵頭行為普遍，部落人口銳減。可以說，原住民大多處於自我治理狀態，其社會組織已有較大發展，具體表現在每個村社都有頭目，有些部落有年齡階層組織，並且不少地區形成了較強的部落聯盟。在清治後期施行的「開山撫番」政策影響下，原住民與政府及漢人的關係日趨緊張，大庄事件及加禮宛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⁵⁶

⁵³ 謝重光，〈清代臺灣客家六堆義民的評價問題〉，《閩臺文化研究》（漳州）2013: 3，頁 5-11。

⁵⁴ 孔潮麗，〈清代臺灣家庭收養初探：基於《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的考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 4，頁 55-61。

⁵⁵ 蔣小波，〈貞節與政治：節烈故事與清代臺灣的婦女生活〉，《臺灣研究集刊》2016: 4，頁 67-76。

⁵⁶ 黃銘松，〈19世紀末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以西文資料為中心〉，《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7: 5，頁 18-24。

清代閩臺關係方面，徐曉望論述了晚清福州與臺北的關係，他認為，自清代中葉起，臺灣北部與福州之間的貿易開始發展，尤其是清代晚期，淡水、基隆與福州之間的船舶運輸，已經成為閩臺之間重要的貿易航線，每年都有近 300 船次的貿易。由於晚清福州港的繁榮，對臺灣北部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拉動作用。同時，臺灣北部的發展，也給福州帶來很多的機會，福州人紛紛到臺灣謀生，臺北也成為福州商品的主要市場之一。⁵⁷

文教方面，李祖基研究了清代臺灣科舉中的「冒籍」現象，指出清代前期，閩粵移民冒籍赴臺參加科舉考試的現象相當普遍，臺灣地方官員對此往往採取默許的態度，閩省官員和巡臺御史曾對其進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他認為科舉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當地人口的文化素質，改善了臺灣這一邊陲地區人口的文化結構。有的科舉移民及其後裔還參與臺灣的土地開發和文教設施建設，在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繁榮和發展地方文教事業中作出貢獻。清代前期臺灣的科舉移民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這一現象表明，海峽兩岸人民之間除了地緣、血緣的關係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極為密切的關係。⁵⁸ 楊齊福探討了臺灣舉人與清代臺灣社會的關係，指出作為臺灣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舉人積極參與各種文教活動，推動了臺灣教育的發展，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繁榮。⁵⁹

民俗宗教方面，學者比較注重研究源於大陸的信仰在臺灣之傳播過程中所發生的轉變。劉大可分析了臺灣客家信仰的特點，認為臺灣客家民間信仰一方面大致承襲了大陸原鄉的信仰特色，體現了兩岸客家民間信仰的共同特徵，但另一方面臺灣客家民間信仰作為一種民俗文化，也隨著移民社會的演變而發生了某些適應性的改變，受不同的時空背景影響，而呈現出自己的信仰特點。這種既傳承又有所變化和吸收的雙重軌跡，是臺灣客家民間信仰的顯著特徵，同時也是移民文化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相互交融和理性選擇的一種結果。⁶⁰ 謝重光考察了慚愧祖師

⁵⁷ 徐曉望，〈晚清福州與北臺灣的城市化建設〉，《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16: 10，頁 187-192。

⁵⁸ 李祖基，〈冒籍：清代臺灣的科舉移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1，頁 62-69。

⁵⁹ 楊齊福，〈臺灣舉人與清代臺灣社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2010: 4，頁 112-123。

⁶⁰ 劉大可，〈傳承與變遷：臺灣客家民間信仰研究〉，《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1，頁 5-17。

信仰在臺灣傳播的特點，指出慚愧祖師信仰由客家原鄉輾轉傳至臺灣，祖師身世、功能、神性、形象乃至信眾族群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民到南投縣拓墾之初，榛莽未闢，瘴癘肆虐，生番為禍，毒蛇、猛獸橫行，缺醫少藥，缺乏安全保障，所以諸如禦番、保生、降服毒蛇猛獸和一切妖魔鬼怪之類，都是墾民生產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都希望有神靈加以保護。他們奉迎而來的慚愧祖師本無這些功能，就把原鄉流行的三平祖師、保生大帝、三山國王等神祇的功能加到慚愧祖師身上。所以說這樣的迭加，既與墾民原鄉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相關，又與墾民新居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攸關。⁶¹

五、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專著、論文集通述

檢索大陸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筆者總共收集到 19 部有關近代以前臺灣史的專著或論文集。其中，有關早期臺灣史有 4 部，明鄭臺灣史有 6 部，清代臺灣史有 6 部，另有跨主題的個人論文集 3 部。以下簡要介紹其中的幾部著述。

李祖基、陳忠純合撰的《社會轉型、抗擊外侮與近代化建設：晚清臺灣歷史映像（1840-1895）》對晚清臺灣史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是大陸地區最早一部專門論述晚清臺灣歷史的著述。⁶² 該書的重點主要有晚清臺灣開埠與外貿的發展及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清政府治臺政策的轉變與臺灣建省，臺灣移民社會的轉型，以及外敵的入侵。全書分成十章，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臺灣軍民的抗英鬥爭」、「通商口岸的開放與對外貿易的發展」、「移民社會轉型」、「西方列強對臺灣的覬覦與侵擾」、「『牡丹社』事件」、「清廷治臺政策的轉變與臺灣近代化建設的開始」、「外貿對晚清臺灣社會經濟之影響」、「中法戰爭之臺灣保衛戰」、「臺灣建省與劉銘傳的近代化建設」、「反對日本佔領臺灣的鬥爭」等。

鄧孔昭教授所著《鄭成功與明鄭在臺灣》一書，集合了鄧氏多年研究鄭成功與明鄭歷史的成果，尤其鄭成功反清復明的鬥爭及明鄭與臺灣的關係，作了較為

⁶¹ 謝重光，〈慚愧祖師身世、法號、塔號、信仰性質諸問題及其在臺灣傳播的特點試析〉，《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2: 4，頁 64-71。

⁶² 李祖基、陳忠純，《社會轉型、抗擊外侮與近代化建設：晚清臺灣歷史映像（1840-1895）》（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

深入的研究。⁶³ 該書不僅論述了鄭成功的爵號由來、對鄭芝龍遺產的批判繼承、收復臺灣的戰略運籌以及指揮作戰的特點，還探討了明鄭臺灣的行政建置、社會經濟，以及明鄭與清政府、荷蘭殖民者的關係。最後，該書還討論了與清統一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主張。

陳支平教授的《臺灣文獻與史實鉤沉》，是在陳氏近年搜集海內外涉臺文獻的基礎上，著重於介紹以往較少為人關注的文獻資料，或對其中稀缺孤本（如《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師中紀績》、《閩頌彙編》、《難遊錄》、《靖臺實錄》、《臺陽百詠》等）的史實分析，或依據新發現史料討論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及政府之間的關係，或對民間族譜及其他雜書的史料解讀。⁶⁴

張崇根教授撰寫的《臺灣史前史與早期史》，是其舊著《臺灣四百年前史》的修訂版。⁶⁵ 張氏在盡可能運用臺灣考古學的第一手資料，並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討論了自 3 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至明天啟 4 年（1624）荷蘭殖民者侵佔臺南，長達 3 萬多年的臺灣歷史。張氏將臺灣古史分成「採集漁獵時期」、「刀耕農業時期」、「鋤耕農業時期」、「鐵騎時代」、「三國時期的山夷」、「隋唐時期的流求人」、「宋代的毗舍邪人」、「元代的漢人與琉球人」、「明代的東番人與漢族移民」等時期，藉以闡述「臺灣的居民、臺灣 3 萬年以來的文化」與大陸的淵源關係，以及「海峽兩岸人民、文化是如何交流、互動的」。

周運中的《正說臺灣古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近年來新發現的史料，對清代以前大陸文獻記載中的涉臺內容作了考訂與辨證，並探討兩岸關係的相關史事。⁶⁶ 周氏提出應注意大陸與臺灣關係史有官方與民間兩個層面，歷史上大陸與臺灣之間航路的發展，他認為臺灣在明代前已進入世界貿易圈，而近代以後，東西方的海上勢力在臺海地區的交匯，塑造了臺灣在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中「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

論述閩臺歷史關係方面的論著也比較多。如汪毅夫所撰《閩臺地方史論稿》，發掘了不少比較罕見的閩臺零散民間歷史資料，並進行細緻的整理和研究，補充

⁶³ 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在臺灣》（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⁶⁴ 陳支平，《臺灣文獻與史料鉤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⁶⁵ 張崇根，《臺灣史前史與早期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⁶⁶ 周運中，《正說臺灣古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

原有史料的不足，訂正部分既有研究的錯誤。⁶⁷ 許維勤在其所著《閩臺建制與兩岸關係》一書中，梳理了福建與臺灣行政關係發生、發展、變化和延續的過程，指出閩臺行政關係的產生，「既是一種基於地理關係的歷史必然，又是其他各種關係得以深化的重要基礎」。⁶⁸ 作者認為一方面應該從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角度認識臺灣開發的過程，一方面也應從近現代國際政治秩序震盪和重構的高度，分析臺灣主權歸屬的明確過程。徐曉望的《早期臺灣史考證》一書，收錄了其所撰〈「沉東京、浮福建」與閩臺古文明起源的假說〉、〈論吳隋二代臺灣移民進入大陸南部〉、〈梁嘉彬「流求論」的成功與失誤〉等文章。⁶⁹

論文集方面，由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的《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紀念康熙統一臺灣 3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是在該中心舉辦的「紀念康熙統一臺灣 3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基礎上，集合部分與會論文編輯出版。該論文集內容相當廣泛，基本反映了新世紀以來大陸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⁷⁰

由鄧孔昭教授主編的《閩粵移民與臺灣社會歷史發展研究》一書，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利用檔案、方志、族譜等文獻資料，選擇以往較少關注的問題作了探討，如荷據時期臺灣漢族移民與荷蘭人、原住民的關係，還有清代女性移民、漢族移民與原住民通婚狀況、康雍年間臺灣移民的婚姻與家庭等問題，推進了學界對清代以前（以清代為主）大陸移民臺灣的過程及其與臺灣社會發展之關係的認識。⁷¹

六、大陸地區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涉臺史料的出版

近十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最值得提及的一個成果就是涉臺史料的整理出版，成果十分豐碩。首先要提到的是鄒愛蓮主編的《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該套史料叢書是「臺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館

⁶⁷ 汪毅夫，《閩臺地方史論稿》（福州：海峽書局，2011）。

⁶⁸ 許維勤，《閩臺建制與兩岸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⁶⁹ 徐曉望，《早期臺灣史考證》（福州：海風出版社，2014）。

⁷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紀念康熙統一臺灣 3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⁷¹ 鄧孔昭主編，《閩粵移民與臺灣社會歷史發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

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和《民間遺存臺灣文獻選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明清檔案出版專案之一。⁷²全書 230 冊,按編年體例影印出版,設總目 2 冊,匯總列於書首。各冊目錄,另行分別列於各冊。書中輯錄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明清兩朝臺灣問題檔案總計 16,343 件,其中明代檔案主要選自兵部題行稿,共 25 件;其餘選自軍機處上諭檔、軍機處「臺灣檔」、軍機處錄副奏摺等清代檔案。其內容包括鄭氏逐荷、康熙統一、乾隆平定、臺灣開埠、臺灣設省、乙未割臺等重大事件,還有政制設置、官員任免、移民開發、漢「番」關係、海疆防務等諸多閩臺地大小政事。這些檔案記載了明清中央政府管轄和治理臺灣的真實情況,全面反映了臺灣三百多年間的歷史變遷和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對於推動明清臺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與福建師範大學合作編輯的《明清宮藏閩臺關係檔案匯編》(下稱「閩臺關係匯編」),該彙編共 30 冊,在上述《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下稱「臺灣檔案匯編」)基礎上,補錄了 2,000 多件宮藏檔案。⁷³「閩臺關係匯編」除了進一步豐富「臺灣檔案彙編」的內容,還特別注重體現清代福建與臺灣的軍事統屬及科舉考試關係,如收錄有關閩臺之間的「班兵制」、福建鄉試題名錄中見載臺灣各縣考生名單等相關文獻。

由方寶川、謝必震主編的《臺灣文獻匯刊續編》(下稱「續編」),是在《臺灣文獻匯刊》的基礎上,按其體例,進一步收錄了之前未及時編入的部分其他知見史料,歷 10 年之功編成。⁷⁴「續編」分成 8 個專輯,匯錄了大量明清以來有關臺灣的詩文集、專題文獻史料、輿志風俗、公私文書、民間契約、譜牒家乘、稀見臺灣刊物等,凡 150 種,共 100 冊,內容相當豐富。

陳支平負責主編的《民間遺存臺灣文獻選編》也是「臺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的組成部分之一。⁷⁵該套文獻選編以民間私家收藏的涉臺契約文書、籍賬、碑文及民間教科書、宗教科儀等冊籍為主要內容,還收錄了部分清代官衙文書抄本、

⁷² 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⁷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合編,《明清宮藏閩臺關係檔案匯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⁷⁴ 方寶川、謝必震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續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⁷⁵ 廈門大學、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民間遺存臺灣文獻選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家族文書、日記等資料。其中，有臺灣中部契約文書、楊同興家族文書及族譜、泉州鑑湖張氏家族涉臺文書、臺灣民間教育文獻及《水竹居日記》等，清代官衙文書則包括文武衙門簿、北路理番分府票簿、彰化縣主成票簿、彰化縣主案簿、北路理「番」分府案簿、北路理憲案簿、岸裡社守土隨軍「番」勇清冊等。

《臺海文獻匯刊》由蕭慶偉、鄧文金、施榆生主編，該史料叢書是在「臺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的基礎上，進一步搜集開拓文獻資料編輯而成。⁷⁶ 叢書主要包括「臺灣義勇隊檔案文獻集成」、「臺海詩文集」、「海疆文獻叢編」、「民國時期臺灣稀見刊物叢編」等四部分，總共 60 冊。其中包括了之前尚未公開的臺灣義勇軍地方檔案、從日本內閣文庫收集有關鄭芝龍海商集團的《經國雄略》等涉臺史料。

《閩臺族譜彙刊》、《閩南涉臺族譜彙編》分別由陳支平與蕭慶偉、鄧文金、施榆生主編。前者共 50 冊，收集閩臺地區民間族譜計 106 部，時間跨度自明隆慶 4 年（1570）編纂的族譜《水美王氏族譜》直至當代的 1990 年代，前後四百餘年；⁷⁷ 後者共 100 冊，以族譜涉及閩臺關係為原則，彙集閩南地區涉臺民間族譜計 100 種，大部分修纂於清代和民國年間，有少數修纂於明代及當代。⁷⁸

此外，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選的《民國時期臺灣經史文獻選編》也收錄了部分民國時期有關臺灣史的文獻材料。

除了上述大型的文獻史料叢書，還有其他較小系列或單種點校史料。如九州出版社策劃的「中央政府管理臺灣歷史文獻叢編」，迄今已出 4 種，包括尹全海主編的《清代福建大員巡臺奏摺》（2 冊）、《清代巡臺御史巡臺文獻》（1 冊）、《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分清代、民國兩卷，共 2 冊）和王鴻鵬輯《臺灣科舉史料彙編》（2 冊）。尹全海所編的 3 部史料集，分別以清代巡臺御史、清代福建大員輪值巡臺的奏摺等資料，以及清代及民國中央政府的賑濟臺灣相關原始文獻的史料選編奏摺等檔案文獻為資料來源；⁷⁹ 王鴻鵬則依據兩百餘種臺灣史

⁷⁶ 蕭慶偉、鄧文金、施榆生主編，《臺海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

⁷⁷ 陳支平主編，《閩臺族譜彙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⁷⁸ 蕭慶偉、鄧文金、施榆生主編，《閩南涉臺族譜彙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⁷⁹ 尹全海主編，《清代巡臺御史巡臺文獻》（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尹全海主編，《清代福建大員巡臺奏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尹全海主編，《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清代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尹全海主編，《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民國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料，從中遴選出科舉史料，按照制度沿革、學校與選舉、題名錄、人物、藝文等五部分編輯成冊，力圖全面真實地反映臺灣科舉全貌。⁸⁰ 這 4 部史料集的編撰目的均在於推進有關清政府及民國政府對臺灣的治理措施與政策的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李祖基教授整理並點校的《行間紀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一書，該書重現了久已湮沒的吳英史料，對於研究明鄭及清統一臺灣的歷史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⁸¹

七、結論

就大陸地區整體臺灣史研究的情況而言，2000 年以來，學界研究的重心仍在日據及戰後臺灣史部分。⁸² 這種情況還反映在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選題上。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查詢近年來的臺灣史研究博士論文，發現 2000 年以來，博士論文明顯增多，總數大致有 66 篇，學生大多來自廈門大學及福建師範大學等大學。⁸³ 其論文選題的時段，除了 9 篇通論性論文，主要集中於日據及戰後。研究明鄭及清代分別有 1 篇和 10 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為明鄭集團的海商性質，清政府的治臺官員、機構及措施，另有 2 篇涉及農業經濟及漢「番」關係研究。

即使如此，近十年來，大陸地區通論及近代以前的臺灣史研究，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仍有長足的發展，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清代臺灣史得到長足的發展，無論各類資料整理或是學術著述，均有頗為豐厚的成果。其中，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受到學界的重視，相較而言，經濟史研究的熱度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大

⁸⁰ 王鴻鵬輯，《臺灣科舉史料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⁸¹ 吳英撰、李祖基點校，《行間紀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

⁸² 可參見：陳小沖，〈近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1-24；陳忠純，〈大陸臺灣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分析：以《臺灣研究集刊》歷史類論文（1983-2007）為中心〉，頁 71-81。

⁸³ 筆者從「中國知網」（CNKI）資料庫收集的博士論文中，選擇研究主題為「臺灣」，學科範圍分別設定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專門史」、「世界史」、「歷史文獻學」、「中共黨史」、「教育史」7 個學科，再從中篩選以臺灣史作為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共收集到 66 篇。不過，筆者查詢廈門大學博士論文庫，僅臺灣研究院的臺灣史博士論文就有 16 篇之多，其中被 CNKI 系統收錄的只有 2 篇，說明該資料庫收集的學位文獻還是很不全。但筆者從國家圖書館的博士論文庫中檢索的結果，同樣存在不少缺漏，故現在的資料只能作為參考。還需要提到的是，其中有少數作者是臺灣學生。

陸學者對原住民研究興趣較之以往更加濃厚，顯示大陸臺灣史研究日趨多元且深入。當然，通過論文統計還可看出兩岸關係史研究所佔比例較高，其原因除了特定時代促使大陸學者重視研究和重現兩岸的歷史聯繫，也有大陸學者所擁有的文獻資料等研究條件更利於從事相關主題的研究。本文所例舉諸如楊彥杰、徐曉望、鄧孔昭、李祖基等教授的著述，在其多年研究基礎上，利用大陸新發現、新整理的材料，對舊說提出新解，基本代表大陸地區水準較高的研究論著。一些學者研究領域雖主要不在臺灣史領域，但因發見有關臺灣的新史料，也為臺灣史研究作出貢獻，如魯西奇、鄭永華、劉耀、陳文新等老師。就研究主題而言，大陸學者關心的議題除了早期兩岸關係，還有清廷治臺政策、建省與近代化建設、土地開發、漢「番」關係、「番界」主權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選題同樣受到臺灣學者關注，兩岸學界未來可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有更廣泛深入的交流探討。此外，就研究群體而言，本文述及的通論及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仍然主要集中於北京及福建地區，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及福建師範大學閩臺研究中心是近代以前臺灣史研究的研究主體。

近年來，大陸地區的文獻資料整理與學術研究顯示了良好的互動效應。前者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有助於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深入，而學術研究的進步，也進一步刺激文獻資料搜集整理的加強完備。無論是官方的檔案文獻，還是民間的契約文書，都有不少的成果。此外，兩岸學者學術交流的成果也不斷增多，在檢索中，筆者發現了不少臺灣學者在大陸發表的著述。而大陸學者利用臺灣等海外整理的文獻史料，也早不鮮見。

就目前的情況看，在文獻資料整理方面，涉臺史料的整理收集範圍需要繼續擴大，相關資料化建設也有待加強。近年大陸涉臺史料的搜集整理雖然成果豐碩，但大陸臺灣以外的海外文獻搜集還不夠。臺灣作為中國東南海疆的最前沿，歷史上曾面臨多重勢力的侵襲，也因此在日本及西人文獻中留下數量頗多的記載。這些資料對於臺灣史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亟待進一步搜羅整理。「臺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列有「海外遺存臺灣文獻選編」（共50冊），尚未正式出版。期待該套史料彙編能儘快完成，並推動海外文獻搜集整理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文獻資料整理方面有待加強的另一個問題是相關資料庫建設稍顯滯後。未來如果能

整合各類文獻資料，依據學術研究的需求，建立臺灣史研究的綜合資料庫，將使得研究更加便利。

其次，雖然大陸的臺灣史研究強調從中國史的視野看待兩岸關係，但總體而言，臺灣史研究與整個歷史研究領域，尤其是中國史研究，銜接仍不夠緊密。過去二、三十年間，大陸的中國史研究發展更新有目共睹，但臺灣史研究對於相關歷史研究成果的借鑑顯得不足。尤其，近年中國史研究逐漸注重從全球史的視野，檢討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的發展變遷，但相關大陸地區的臺灣史研究很少從全球史或東亞史的角度，解析大陸與臺灣的歷史聯繫。未來如何應對來自兩岸、乃至全球史研究視野更新的挑戰，是大陸臺灣史研究者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最後，大陸臺灣史研究應該繼續突出「兩岸特色」。如陳孔立教授所言，臺灣史研究應立足於兩岸互動的基礎上，以做到「瞭解之同情」。

引用書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據資料庫」，下載日期：2019年3月20日，網址：<http://fz.people.com.cn/skygb/sk/>。

尹全海（主編）

- 2009 《清代巡臺御史巡臺文獻》。北京：九州出版社。
- 2011 《清代福建大員巡臺奏摺》。北京：九州出版社。
- 2013 《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清代卷》。北京：九州出版社。
- 2014 《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民國卷》。北京：九州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

- 2015 《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紀念康熙統一臺灣3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合編）

- 2016 《明清宮藏閩臺關係檔案匯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孔潮麗

- 2011 〈清代臺灣家庭收養初探：基於《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的考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11(4): 55-61。

王鴻鵬（輯）

- 2016 《臺灣科舉史料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方寶川、謝必震（主編）

- 2016 《臺灣文獻匯刊續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左玉河

- 2013 〈明清鼎革之際的臺灣儒學〉，《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3(6): 99-105。

吳英（著）、李祖基（點校）

- 2016 《行間紀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吳春明

- 2009 〈臺灣阿美族的「織樹為布」工藝及其文化史意義〉，《廣西民族研究》（南寧）2009(3): 145-157。
- 2010 〈「島夷卉服」、「織績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2010(1): 71-77、93。

李祖基

- 2010 〈論雍正年間臺灣「番」地開墾政策的變化：以《巡臺錄》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0(3): 1-10。
- 2011 〈冒籍：清代臺灣的科舉移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2011(1): 62-69。

李祖基、陳忠純

- 2016 《社會轉型、抗擊外侮與近代化建設：晚清臺灣歷史映像（1840-1895）》。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李 理

- 2015 〈1874 年日本出兵侵臺的幕後指使者〉，《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2015(6): 107-115、191。

李細珠（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

- 2015 《中國大陸臺灣史書目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智君

- 2012 〈海洋政治地理區位與清政府對澎湖廳的經略：以風災的政府救助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2(11): 65-77。
- 2017 〈無遠弗屆與生番地界：清代臺灣外國漂流民的政府救助與外洋國土理念的轉變〉，《海交史研究》（泉州）2017(2): 38-67。

杜維超、張盛文

- 2013 〈實學與閩學在臺灣儒學發展中的思想對立及合流〉，《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福州）2013(3): 67-71。

杜 輝

- 2017 《據有他者：帝國、知識與臺灣原住民物品收集實踐（1850-1945）》。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汪毅夫

- 2011 《閩臺地方史論稿》。福州：海峽書局。

林仁川、盧美松（主編）

- 2014 《中華地域文化通覽·臺灣卷》。北京：中華書局。

周運中

- 2015 〈南宋臺灣毗舍耶人與談馬顏人新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5(1): 5-9、17。
- 2016 《正說臺灣古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袁 韻

- 2016 〈徐孚遠與幾社的創立與傳衍〉，《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6(5): 56-64、169-170。

孫 煒

- 2011 〈防撫之間：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及應對——《臺海使槎錄》所反映的清前期治臺政策分析〉，《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恩施）2011(2): 113-116。

徐曉望

- 2010 〈明末西班牙人佔據臺灣雞籠、淡水時期與大陸的貿易〉，《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0(2): 1-8。
- 2011 〈元代瑠求及臺灣、澎湖相關史實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1(4): 49-57。
- 2012 〈論唐宋流求與臺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2(1): 5-12。
- 2014 《早期臺灣史考證》。福州：海風出版社。
- 2016 〈晚清福州與北臺灣的城市化建設〉，《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16(10): 187-192。

徐曉望、徐思遠

- 2013 〈論明清閩粵海洋文化與臺灣海洋經濟的形成〉，《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3(1): 5-13、38。

陳小沖

- 2009 〈近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8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頁 1-2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第一會議室，12 月 17 日。

陳孔立

- 2013 〈前言〉，收於陳孔立，《臺灣史事解讀》，頁 1-3。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7 〈建構兩岸共同史觀的嘗試〉，《臺海研究》（上海）2017(2): 1-7。

陳支平

- 2015 《臺灣文獻與史實鉤沉》。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支平（主編）

- 2009 《閩臺族譜彙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陳忠純

- 2009 〈大陸臺灣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分析：以《臺灣研究集刊》歷史類論文（1983-2007）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09(2): 71-81。
2010 〈論傳教士利勝與鄭氏集團的關係：以利勝的外交使命為中心的考察〉，《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0(2): 9-15。
2011 〈清前期平民領照渡臺的範圍探析：兼議限制渡臺政策的轉變及其原因〉，《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2011(2): 76-84。
2014 〈雍正時期閩臺地方官治臺主張探析：以沈起元的治臺論為中心〉，《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2014(6): 81-90。
2015 〈19 世紀初期閩臺地方官開發臺灣東部「番地」的主張探析：以噶瑪蘭及水沙連地區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5(4): 56-64。

陳 思

- 2016 〈再論「何斌事件」的前因後果：兼議鄭成功收復臺灣前的一系列動作〉，《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6(5): 68-76。
2017 〈從各方史料看顏思齊與李旦及荷蘭殖民者之間的關係〉，《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7(5): 79-85。

陳 慎

- 2016 〈從荷文史料看荷據時期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宜昌）2016(5): 44-50。

陳舒劫

- 2015 〈戰火中的傳承：明鄭時期閩臺儒學的親緣關係〉，《石家莊學院學報》（石家莊）2015(1): 22-27。

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 2009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張先清

- 2008 〈17世紀歐洲天主教文獻中的鄭成功家族故事〉，《學術月刊》（上海）2008(3): 131-142。
2013 〈傳教、衝突與文化解釋：17世紀臺灣原住民與天主教的相遇〉，《學術月刊》（上海）2013(12): 141-151。

張 侃、董麗瓊

- 2016 〈清代臺灣北部的汀州客家移民合作墾殖和共有形態論析：以契約文書等文獻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16(3): 44-60。

張春英

- 2014 《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史（上、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張海鵬、李細珠（主編）

- 2015 《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海鵬、陶文釗（主編）

- 2010 《臺灣簡史》。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2 《臺灣史稿（上、下卷）》。南京：鳳凰出版社。

張崇根

- 2009 〈臺灣世居少數民族源於東夷說述論〉，《黑龍江民族叢刊》（哈爾濱）2009(2): 78-90。
2017 《臺灣史前史與早期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張彩霞、林仁川

- 2010 〈中國海商：17世紀臺海貿易的主導者〉，《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10(4): 71-76。

張衛明

- 2014 〈借法異域：1874年臺灣漂民案中的國際法話語建構〉，《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4(1): 31-40。

許倬雲

- 2016 《許倬雲說歷史：臺灣四百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修訂版。

許維勤

- 2015 《閩臺建制與兩岸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連晨曦

- 2016 〈1874年臺灣事件與晚清國家主權觀念的轉變〉，《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秦皇島）2016(2): 70-74。

程朝雲

- 2012 《臺灣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 〈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與再出發：紀念康熙統一臺灣3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紀念康熙統一臺灣3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503-512。北京：九州出版社。

黃俊凌

- 2016 〈17世紀上半葉臺灣海峽貿易主導權問題新探：以荷蘭侵佔臺灣初期的轉口貿易為中心〉，《世界歷史》（北京）2016(5): 95-110、159。

黃銘松

- 2017 〈19世紀末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以西文資料為中心〉，《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宜昌）2017（5）：18-24。

賈 益

- 2009 〈1874年日軍侵臺事件中的「番地無主」論與中國人主權觀念的變化〉，《民族研究》（北京）2009（6）：88-98、110。

賈小葉

- 2014 〈論清人對臺灣地位認知之變遷（1661-1875）：以官方為中心〉，《近代史研究》（北京）2014（4）：67-83、160。

- 2016 〈晚清臺灣建省的臺前與幕後〉，《史學月刊》（開封）2016（7）：88-98。

廈門大學、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 2011 《民間遺存臺灣文獻選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楊彥杰

- 2013 〈百年魚塢：清代東石蔡氏在臺灣的魚塢經營〉，《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3（6）：69-82。

楊益茂、宋桂芝（編著）

- 2012 《臺灣：歷史與現狀》。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楊齊福

- 2010 〈臺灣舉人與清代臺灣社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2010（4）：112-123。

董建輝、周慧慧

- 2016 〈移民、土地與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16（3）：29-37。

劉大可

- 2017 〈傳承與變遷：臺灣客家民間信仰研究〉，《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7（1）：5-17。

劉正剛、喬玉紅

- 2010 〈從化外到化內：清代臺灣土著軍事化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成都）2010（1）：267-272。

劉彼德

- 2010 〈1636年淡水原住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鬥爭〉，《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0（4）：67-76。

- 2011 〈17世紀荷蘭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結構和特徵〉，《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1（3）：85-94。

劉 耀、陳文新

- 2016 〈朝鮮使者筆下的臺灣原住民賀壽朝覲活動述略〉，《東疆學刊》（延吉）2016（4）：7-12。

蔣小波

- 2016 〈貞節與政治：節烈故事與清代臺灣的婦女生活〉，《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6（4）：67-76。

鄧孔昭

- 2009 〈明鄭臺灣天興萬年二縣（州）轄境的再探討〉，《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09（3）：57-64。

- 2010 〈試論清代臺灣的女性移民〉，《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0（5）：73-84。

- 2011 《閩粵移民與臺灣社會歷史發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2013 《鄭成功與明鄭在臺灣》。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2017 〈鄭經的婚姻情感生活與鄭氏集團的兩次內亂〉，《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17（3）：83-89。

鄭永華

- 2014 〈未經啟用的臺灣總兵關防與晚清臺灣建省之波瀾〉，《近代史研究》（北京）2014(4): 147-151。
2017 〈光緒三年新鑄臺灣總兵關防考論〉，《歷史檔案》（北京）2017(2): 101-108。

魯西奇

- 2017 〈流求王歡斯渴刺兜：臺灣歷史上的「印度化時代」〉，《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漢）2017(5): 120-128。

龍金順等（編譯）

- 2017 《近代閩臺社會風貌：〈教務雜誌〉文章選譯（1867-1941）》。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謝重光

- 2012 〈慚愧祖師身世、法號、塔號、信仰性質諸問題及其在臺灣傳播的特點試析〉，《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2(4): 64-71。
2013 〈清代臺灣客家六堆義民的評價問題〉，《閩臺文化研究》（漳州）2013(3): 5-11。

蕭慶偉、鄧文金、施榆生（主編）

- 2014 《臺海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4 《閩南涉臺族譜彙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aiwan History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9 to 2017: General Research and Pre-modern Era

Zhong-chun Che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in mainland China (general research and the pre-modern er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both breadth and depth.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s the study of Qing Taiwan history, with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data collation and academic public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fields, politic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have aroused much research interest, while studies on economic history are less popula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ainland schola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aborigines than before, revealing the growth in diversity and depth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Moreover, statistics on publications also indicates higher propor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Such dominance in research can be attributed to greater emphasis of mainland scholars on reconstruction of cross-strait historical ties of specific eras and availability of literature and archived documents conducive to related studies.

Interaction between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has proved to be mutually beneficial. On one hand, systemic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ed facilitate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academic research promotes further coll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Fruits of such interaction have been seen in compilation of public-sector archives and civil contracts as well as increasing achievements as a result of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s.

Keywords: Taiwan History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China General Research, Pre-modern Part, Journal Paper, Monograph,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